

建国初期至七十年代天水城区中等教育发展侧记

朱庆彰

1955年8月，我从天师普师毕业后，分配到原天水市第一初级中学任教。1956年夏第一初级中学改名天水市二中，天水市三中建在玉泉观建立。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这年仅初一级招收新生一中6班，二中8班，三中4班，共计约1210人，比上年成倍增长。

中学生在校人数的猛增，教师队伍数应壮大，教师素质也急需提高。当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从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记得地市委宣传部门的领导，经常深入学校指导教师学习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学习《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鼓励教师积极参加业务进修。1956年秋，我和各中学的语文、数学教师20多人，同时考入西北师院函授进修。大家学习的劲头很足，比如一中的数学教研组长陈惠生老师，那时已近40岁，业务能力很强，但还坚持函授进修，平时课余自修，寒暑假集中到师院面授，虽然条件很艰苦，我们都甘愿吃苦，乐于其中，一直坚持学到1959年毕业。

1957年夏，原甘肃师范专科学校从天水迁到兰州，天水市三中即从玉泉观搬出，占用了师专校址。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正当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却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场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当时天水市二中，只有教师60多人，竟划定所谓右派分子11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整风反右之后，接着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学生上山下乡，参加大炼钢铁。我那时正当年轻力壮，曾带领学生到南山水家沟开荒造田，到北道炼焦厂大炼钢铁。违背客观规律，大轰大嗡，得不偿失，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58年深秋，大跃进期间，原天水市和天水县合并，新成立的天水市委占用了天水市二中校址，（即现秦城区政府所在地）。天水市二中迁到天水郡占用了原天水县政府地址，（即现仪表厂）。市县合并后，天水县一中改名天水市四中，在七里墩新建了天水市五中。连续几年的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教育事业也相应调整。1961年夏，天水市二中高中部分的四班学生合并到一中，五中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全部合并到二中。为了恢复稳定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中央制定下达了全日制中学暂行规定四十条。这年秋甘肃省教育学院也正式成立，开始培训中学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教师。我这时已担任了二中教导主任，被选送到省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班

学习一年。1962年夏，返校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教育事业也出现了新的转机。但二中距离城区较远，多数市内学生绕道西大桥往返步行困难很多。广大师生、家长都要求将二中迁到城区内。63年秋，省教育厅长刘海声到天水市二中亲自了解情况后，决定由省厅给二中增拨专项经费24万元，兴建教学大楼，解决迁校问题。1965年秋，二中在建设路新修的教学楼落成，这座能容纳24个教学班的四层教学楼，在当时算是市区临街最宏伟壮观的建筑了。随即二中也就从天水郡迁到东关新校址，二中在水郡莲亭村的分校址开始筹建天水市四中，（因市县又分开，原四中又改名县一中）。第二年四中正式招收新生。

1966年夏，开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暑假期间全市中小学教师集中到二中办学习班，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九月开学后，各中学未能上课，学生成立起红卫兵战斗组织，开展到各地大串连活动，由免票坐车，发展到步行长征。十月我随三名教师和六位同学还步行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经受了锻炼考验。

1967年初，随着各地夺权斗争的深入，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围绕夺权问题，由观点不同的辩论，升格到文攻武卫，进而刀戈相见。二中新建的教学大楼成为武斗的据点，“工事”林立，戒备森严，令人触目惊心。到1968年初各地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学生才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进行斗、批、改。为了彻底改造教育

阵地，先是军宣队进驻学校，后是工宣队占领学校，掌握领导权，清理阶级队伍。学校原有的校长，教导主任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各种历史问题的同志被视为“牛鬼蛇神”，议论过红色政权的同志被打成右倾翻案集团。二中当时有教职员70多人，被群众“专政”的达14人，关进牛棚，冻结工资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经过落实政策，被群众“专政”的教师才逐个解放。我恢复工作后被结合进入二中校革委会。这时中学缩短学制，实行四年一贯制，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0年春，天水市五中占用原步校保育小学扩建成立，接着建二、解一、伊民巷小学戴帽子附设了初中班，城区中等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到197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整顿调整，撤销了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在西关育生巷筹建天水市第六中学。被搞乱了的教学秩序有所恢复。到1974年，“四人帮”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在学校中“批林批孔”还批师道尊严，一时教师中又人人自危，欲教不能，欲罢不忍，莫衷一是。接着工宣队重新进入学校，学生继续学工、学农，各中学组织师生到徽县支援夏收，汇集中梁修梯田，所谓大战黄金月。1976年元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十月，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于是工宣队撤

离了学校，各中学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我担任了二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教学秩序很快恢复。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读书无用”论的风气为之一扫，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广大职工精神振奋，读书育人，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转机。这时，天水市八中在伊民巷小学西侧又积极筹建，我市中等教育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市区内共有师范专科学校一所，师范一所，完全中学六所，初级中学五所。

天水苹果探源

农夫

苹果，在天水已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而极其普通的水果了。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以“花牛苹果”命名的新、老“三红”系列品种，不仅得到省内外广大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外也享有一定的声誉。早在一九七四年，我们天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苹果外销商品基地之一。在一九七七年，“花牛苹果”被评为“北方优质水果”。在八十年代里多次评为部、省优质产品及“全国优质农产品”。当前，全市苹果栽植面积近达五十万亩，年产果品一亿多斤，产值也达到亿元以上，成为我市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出口创汇的重要项目，为天水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栽植面积还在继续扩大，品质还在不断提高，品种还在不断增加。但在半个世纪之前，苹果为何物，见过的人很少，吃过的人就更少了。记得三十年代上学时，曾问过一位“见过世面”的《自然》老师，说苹果就是“花红”，可见人们对苹果的知名度了。

在四十年代初，笔者一工作就踏入“农门”，因工作关系，始与一些农林单位有了广泛接触，也接触到一些有关苹果之事，始知“花红”与苹果虽为同科、同属，但并不同种，其品质要比花红好的多。

早在本世纪初，苹果已在外国有了广泛的栽植。在二、三十年代，在我国一些沿海地区也普遍栽植。即在陕西关中一带，也有较大面积的发展。作为近邻的我们天水，由于交通不便，关山阻绕，思想保守，文化落后，极少有人引种试栽，在农村中能看到苹果的栽植、建园，已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栽植最早的要数一些农林机关单位和天主堂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现黄河水利委员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前身）一成立，即把搜集国内外各种优良果林、草种，营造生物工程，作为制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措施，苹果成为主要搜集对象，即于当年十一月间，特函陕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预先订购了各种果树苗木二百九十株，其中苹果苗一百二十多株，于一九四三春栽植于中山公园东南侧的河北苗圃（现市级机关家属院）内面积十多亩，品种有印度、黄奎，红奎，倭绵、红玉，甘露及旭等共十多个品种，是我们天水最早的苹果园之一，周围群众一直叫它苹果园。

在农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河北苗圃建立苹果园的同年同月，由西北林木公司的张风庭（市林果中心已故工程师）主持，在东郊的东十里和东岔乡码头村牛背的渭河滩上，也建立了两处苹果园。据张风庭工程师生前讲，建园果苗是与水土保持实验区的同时购来的，是他与董新民两人同时去武功选种、选苗，畜驮护运

到天水定植的。至于他所栽植的果园，因他很快离开天水而情况就不清楚了。在建国后，笔者因其它工作曾对两果园有过一些接触，东十里果园，早在解放前后，就遭到破坏，码头村牛背的果园，到一九五八年时还在，但因管理不善，不及时防治病虫害，腐烂病已发展到毁灭性程度，几无收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天主堂的苹果，笔者是在一次偶然的会中才知道的。一九四四年秋，去十方堂天主堂公教医院徐长和大夫家中求医时，发现其庭院中栽有未曾见过的果树，一问始知为苹果，树龄已达盛果期，据说是十多年前（据几年前市林果中心万惠宇工程师调查是一九二七年引进的我市最早西洋苹果，共三十株）由一位神甫由国外带来的，栽在一些神职人员的庭院和“大园子”里（即现建设路忠武巷东侧，面积有几十亩，是个混合型果园）。回单位后，即将此事告诉主持苹果园工作的鄢列庆，他便进一步进行了了解，得知有多种好的苹果品种，还有多种其它果树良种。在实验区的果树繁殖培育过程中，有许多良种果树接穗，就是由天主堂的果树上剪下来的。故可以说，天主堂的苹果对天水苹果的发展做过一些有益的贡献。至于天主堂的果品，一直只供一些“洋人”和高级神职人员享用，一般员工也是享受不到的，更无多余上市场销售，群众大多不知天主堂还有苹果。

在天水苹果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农林部天

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河北苗圃，即群众叫的苹果园。苗圃一成立，即把建立苹果园放到主导地位。首先聘请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果树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管理，精心繁育。如一九四三年，聘请了西农毕业的林果专家董新民主持苹果苗选购、运输以及定植等一系列建园工作。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聘请了中央大学园艺专修科毕业的果树嫁接能手鄢列庆负责管理工作，通过他培训出一批苹果育苗、嫁接和修枝等技术人员，成为解放后我市发展苹果事业的骨干，有的人至今还健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又由林果专家薛志忠负责管理工作，直到一九五〇年。第二，及时总结、鉴定，防止多走弯路。建园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四年秋季，趁中央林业实验所技正、高级果树专家沈蕩来西北视察之机，请来天水，对苹果作出“适宜发展”的鉴定结论。一九四七年，当苹果第一年有了果实时，请来有关单位及附近一些农民，进行了品尝鉴定，公认红奎、旭、甘露等为优。即把这些品种，作为今后大力繁育对象。第三，大量繁殖苗木，进一步建园推广示范，在天水“适宜发展”苹果的鉴定结论后，即把重点放到苹果的自繁自育上来，从一九四四年秋冬开始，每年派人在武山、清水等林区采集以山定子为主的各种野生种子，进行育苗，仅一九四五年一年，育出各种砧木一千四百多株，进行了嫁接，于一九四七年，在新建的龙王沟苗圃用土生土长的苹果苗木建成了第二个果园，

面积二十多亩。同时还把二十多株，分送有关单位及石马坪、土坑等村农民，作为推广示范的起点，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苹果推广工作，到建国后才有了起色。

建国后，天水地委，专署，对以苹果为主的果树工作十分重视，即于一九四九年底，把实验区的林牧组改为林牧园艺组，把河北苗圃，即群众叫的苹果园，改为园艺试验场（一九五四年划归天水地区园艺站），专门进行苹果苗木的繁育，生产及推广示范。一九五〇年计划生产苹果苗一万株，以资推广。并于次年春季，派出技术骨干，工人，去甘谷，天水等县，对群众的一些劣质、低产果树进行嫁接换种改造，对沙果、林檎等高接苹果，开始了苹果推广工作的第一步，也培训了一批农民嫁接骨干。

一九五一年考虑到天水地区山多川少的自然特点，彻底扭转世代相沿的“果园建川，粮食上山”的习惯，为苹果发展开创更广阔的天地，实验区在梁家坪试验场进行了“果树上山”试验，在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一块三亩黄土深厚，通风向阳的坡耕地上，按各七米的株行距，栽植二年生果苗四十四株，每行一个品种，即黄奎、红奎、青香蕉、红玉、旭共六品种，经第一、二年观察，生长正常、健壮，第三年普遍挂果，品质在许多方面，还比川区的要好，成为天水第一个苹果上山示范果园。一九五二年又在天水地委农业合作试点的太京乡田家庄的坡耕地上，无偿支援苹果

苗木，建成九亩山地果园，把苹果的栽植高度又提高一百米，并派人进行科学管理指导，成为天水的第一个苹果上山农村示范基地。同年还与西北果树所(所址在陕西武功)合作，在二十里铺的花牛寨建立了又一个苹果上山示范点，即“花牛苹果”的最早果园。

为了把苹果上山推广到更高的山区，一九五四年，在海拔一千六百米的吕二乡石家堡试验场又建立了一处苹果上山试验基点，面积约二十亩，品种由梁家坪试验的六个增加到十多个，增加了印度，鸡冠，国光等。考虑山高光热条件差等自然因素，采用大距离株行距，每亩仅十株左右，试验结果，生长良好，为把苹果栽植推向更高的山区，提供了科学依据。同年还在石家堡试验场邻近的毛家庄以及武山邓家堡、甘谷清明乡，天水下寨子等地建立多处农村示范基地。一九五五年以后，相继发展多处，原天水地区的十二个县、市、几乎每县都有一、二个苹果农村示范基地，品种由十多个增加到二十多个，示范园面积不断扩大，如田家庄由九亩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亩。对天水苹果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天水地区的苹果的繁殖推广工作，由天水地区园艺站全面负责，黄委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仅对原有农村示范点继续进行管理及技术指导，天水苹果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天水苹果发展到今天这样程度，并非一帆风顺。早在一九五七年，天水地委在《天水地委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规划(草案)》中提出十年发展苹果一千万株的宏伟计划。并把这个“草案”一杆子插到底发到农村党支部广泛征求意见。开始是认识方面的原因，如果粮争地呀，苹果不能上山呀，农民不懂技术呀等；以后是一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如“反右”、“文革”等，使这个计划迟迟不能实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一系列有关农村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对苹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之，天水市委、市政府对苹果的发展极为重视，作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来抓，因而发展十分迅猛，不到十年时间，发展何止一千万株。

笔者虽在“农门”多年，但对苹果工作接触并不多，就建国前后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在苹果推广工作方面的一些情况作为“探源”提出，供苹果研究工作者参考，因确系外行，不妥之处不少，请专家们及一些知情者多加批评指正。

海 外 飘 香

(记海外的天水人徐可昌先生)

熊绿天

当他出现在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作学术报告和讲学时，引起当地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关注。然而却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在台湾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教育家——徐可昌先生。

徐可昌先生是我40年代在天水县立中学(现天水一中校址)读书时的班主任，我对先生的过去比较了解，现就自己知道的一些事实，叙述如下：他一生倾注于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是天水市近百名去台人员中唯一从事教育事业的专家，其果实累累。徐先生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道路，一心为教育事业执著追求，取得丰硕成果。

徐可昌先生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元月十八日，家住天水市秦城区大城城壕(现工农路)。他自小聪慧超众，幼年在其父的教诲下，读弟子规，百家姓，三字经。七岁入城区小学。1931年读完城区东关小学高小部，当年秋季考入甘肃省立天水师范学校就读。一九三九年进入省兰州师范深造，为学校高才生。两年届满返天水，其时天水(县)有四家中等学校闻得徐先生博学广知，便争先下聘书，后来被天水县立中学应聘，先生除当班主任外，还兼代生物，

化学，所授课程，对学生魅力极大，教学卓著，得到师生的爱戴。先生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县中教学期间，以“徐枫”的笔名在《陇南日报》主笔《星期文艺》，培养了当时许多青年习作者，同时先生的硬笔及书法均苍劲有力，飘逸潇洒，人多求书。

一九四五年先生报考甘肃省兰州西北师范化学系攻读；第二年转到北京师院，后又转于北平师范大学学习，重点攻读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理论化学以及物理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所学其成绩均优异。一九四七年寒假，参加北平各大学化学、化工系同学组织之平津参观访问团，分赴平津各有名大学参观学习，使先生的化学更加有所成就，在当时同学中达到领先水平。

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初随校迁往台湾，在台南任教女师附小，其后发现先生学艺高超，五年后提升台北、台中师大任教七年。一九五六年夏季任台湾省立板桥中学教育主任，是年秋到省立师大附中任教。一九六四年先后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聘请，执教十余年，讲授化学及汉语等学科，是近年来华人在外国执教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一九七五年因台湾急需讲授化学的教授，先生又返台湾，在台南定居。在台南各大学任教化学，自编教材自己讲授，在当时化学教授中名列前茅。其间先生撰写

《小学学生制约信念与自然科学学习成就的关系》论文，经当时教育部门审查评议通过，获得高级讲师证书。

在先生返台后，适逢台湾进行小学课程改革，各大专师范院校负责在职教师训练工作，先生被授以辅导主任，责成办理台南师专辅导区四县市担任小学教师新课程研究业务，在改革小学教育中作出显著成绩。

徐可昌先生在五十余年教育生涯中，自己真正起到了为人师表的作用。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他一贯教学认真负责，尤以躬行本，注意身教，严于律己的教学方法，是难能可贵的；他尽管博闻强志，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向专业的高层次探索，以求得生命的最大值。高师出名徒，经他门下教诲的学生学识均很渊博；徐可昌先生为人师表的另一方面是：他不尚虚荣，不慕名位，实事求是，正是这样，他不仅在学生中有着崇高威望，而且在海内外享有威名。

徐可昌先生学识渊博，闻名遐迩，他不仅精通化学，而且文学、英语和书法造诣很深。先生在5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先后撰写了“科学园区分区教学设计——一种幼稚园科学教育方式之研拟”等多篇论文，得到海内外行家的赞许。先生撰写的“乙炔化学及应用上可能发展之探讨”等多篇论文由台湾久洋出版社出版发行，有些论文还刊于台南大专院校的学报。发行后引起海内外

同行的关注。

一九八九年先生退休后，还执教不舍，大有“朝闻道而夕死可矣”的精神，他仍被台南师院聘邀授课，主讲大学部三年级的有机化学（这门课十多年来由他一个主讲，是现在台湾仅有的一位研究有机化学的专家和学者）。讲授深入浅出，成绩斐然。徐先生老骥伏枥，退而不休，正如他自己告慰的“春蚕吐丝方未尽，待到满园桃李春”。这可能是他的写照吧！而今他的学子已遍海内外。他为了将其一生的执教记述，编纂了《秋实集》以记之。

徐可昌先生抱着热爱祖国，缱绻家乡的诗情画意，于一九九〇年七月，偕夫人台湾著名的地理教师邹秋莲女士返天水市秦城区探亲，在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中写下了《天涯情愫》诗一首即：

几番风雨几度秋，花落花开惹人愁。

欣见三五桃李绽，春风过处不见忧。

南山碧水依旧在，明月千里上阳头。

与君共饮一杯酒，再期他日陇上游。

接着还写下了缱恋故乡的诗篇即：

柳绽黄金的春天，荷兰盛放的夏天。

果实累累的秋天，白雪皑皑的冬天。

在先生回乡的日子里，天水报、天水电视台和秦城区广播站均作了报道。

记甄福堂烈士的事迹

熊绿天 辑 原作：郭建民

现在天水秦城区吕二沟石马坪靠西的烈士陵园里，埋葬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革命烈士甄福堂同志。他在水、陇南解放事业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年春季市区的中小学的学生为烈士甄福堂同志扫墓。当前天水文史亦有记载，诸多简略，唯有郭建民同志撰写的甄福堂烈士史略较详，故汇集如下，以留青史。

甄福堂，甘肃通渭县青保乡甄家山人。生于1917年3月，1936年7月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一九四三年末，因关注和同情甘南农民起义军的遭遇，受到当地恶霸的恐吓和陷害，被迫离乡，到国民党陇南师管区二营当了一名上士书记员。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使他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随又含愤回乡。

正当甄福堂为自己命运陷入深深的苦恼之时，在一九四七年二月，通渭籍的中共陇右地下党负责人毛得功借串亲访友之名，回乡秘密开展建党活动。就在这时，甄福堂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一段考验后，毛得功同志便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工作，忠实执行党所分配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通渭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通渭县毛家老湾成立，甄福堂就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从此，他努力开辟本地区工作，在